

江村销夏录

(江村书画目附)

〔清〕高士奇 撰

邵彦 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 新世纪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清〕高士奇撰 邵彦 校点

江村销夏录

（江村书画目附）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清)高士奇撰;邵彦校点.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传统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70-X

I.①江… ②江… II.①高… ②邵… III.①汉字-法书-中国
- 古代-目录②中国画-中国-古代-目录 IV.K879.4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744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马 芳 李忠孝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刘 璞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55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9.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弁言

在《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两年来，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

据专家研究，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万有文库》，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美国的《纽约时报》曾有论评，说他是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诚如专家们所说，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吾辈有幸，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选择终将存在。我们师法先贤，着眼现实，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而非一时。我们希望，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读者在这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时论近说，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子弹”。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书本”，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

“书本”。在今天做这工作，不免有“老掉牙”之讥，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更有汲深绠短之叹。但是，据我们浅见，造就一代新民，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了解历史故实，掌握前人经验。人类之所以有“书本”一物，其主要功用之一，不正在于此乎？！

按此设想检视，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及其相关资料。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不无裨益。因为终究来说，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也许会想到，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本书说明

《江村销夏录》是清初官僚收藏家高士奇所撰的一部书画著录书。

高士奇(1645—1703),字淡人,号江村、竹窗等,浙江钱塘人。家道小康,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在诗、书、画等方面都打下了一定基础。20岁时举家入都,25岁入国子监为监生,因偶然的机,其书法被清圣祖赏识,充翰林院书写序班。康熙十六年(1677),南书房设立,高士奇成为首批入值官员,并得赐第于皇城西安门内。他不但擅长诗歌和书法,而且性情机敏恢谐,善于逢迎而不露痕迹,因此成了清圣祖不可暂离须臾的近臣。康熙二十八年(1689)圣祖南巡至杭州,特意临幸士奇在西溪的别业花溪草堂。高士奇倚仗这种特殊宠信,逾越文学侍从的职权范围,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与满族权臣索额图、明珠以及另一名江南籍文学侍从徐乾学一起卷入了激烈的政治倾轧,结果是数败俱伤,高、徐都被命休致回籍。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并未返回杭州,而在浙江平湖县购买田宅定居,逐为平湖人。清圣祖对赋闲的宠臣并未忘怀,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召其赴京修书,仍复原官。但高士奇对官场沉浮和朝惕夕厉的近臣生活已兴味索然,三年后即以母老请还乡终养。康熙四十一年(1702),授礼部侍郎,未赴。次年随南巡返回的清圣祖进京,归后卒于家。他不但生前“际遇成千载”,死后也备极哀荣,破格赐谥,圣祖亲笔题写其谥号“文恪”,并荫及子孙。

高士奇作监生时就开始收集古旧字画。清人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谓高获圣祖赏识系由满洲权贵祖泽深、索额图荐引。索氏就有不少书画收藏,高氏为之收集、鉴定出过不少力。进入翰林院后,高士奇

结交了不少富于书画收藏的满汉贵族、官僚，如梁清标、纳兰性德、宋荦、徐乾学、王鸿绪、朱彝尊等，又有机会多次观赏内府藏品，眼界大开，鉴赏能力日渐提高。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合法或非法地聚敛起来的大量财产，为他扩充自己的书画收藏提供了条件。但在这一时期，藏品的交流、欣赏主要是一种政治公关手段。在解职留京和休致回籍闲居平湖的六年中，他才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书画鉴赏活动，这种活动既表现他韬晦自处的姿态，也排遣他由于政坛失意而形成的胸中块垒。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书画鉴赏方面，写下了大量的题跋诗文，并撰写刊行《江村销夏录》，奠定了他作为收藏巨擘的声誉。他一生中最后六年奉母家居的时期是鉴藏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收入的名作不多，但展现旧藏，题跋再三，殆无虚日。他身后的家世不算显赫，但到百年后的嘉庆时代，家中还存留不少书画藏品（可参看方薰《山静居画论》卷下），而清初众多名门望族的收藏往往一、两代后就风流云散，相形之下，高氏的“子孙保之”也算得上一个奇迹了。

《江村销夏录》是高士奇解职居平湖期间，用三年（1690—1693）左右时间写成。“江村”这一别号寄托着他对少年时代在祖籍余姚的读书生活的留恋，他并在平湖城外的别业“北墅”构筑了一组建筑群名为“江村草堂”。本书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夏，故名为“销夏”。卷首有朱彝尊、宋荦序和高士奇自序。朱彝尊在京时曾遭受过高士奇的排挤，对高的人品不能不腹诽，对其鉴赏水平也不敢恭维，因此在序中只赞许本书体例精详、有助于鉴定。朱氏不愧为一代硕儒，他指出的这一点正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宋荦不但是著名收藏家，更是深得清廷倚重的封疆大吏（时任江苏巡抚，驻苏州），也是高士奇极力拉拢的对象。作为一个干练圆通的官僚，宋荦在政治上与高氏保持距离，在书画收藏上则频繁交流、重加推许。在本书序言中，他围绕高氏自序中一句故作旷达之语，阐述了一通顺世养生观点：对书画的聚散得失不必执着萦怀。这与其说是赞许高士奇的人生境界，勿宁说是安慰政坛失意者：功名富贵亦如梦幻泡影，有得必有失，皆当作通达观。宋荦同样未对高氏的鉴

藏水平置一词，本书中著录了一些明显的伪作，大概是逃不过宋莘的眼睛的。可是在次年九月，高士奇奉诏赴京，舟过苏州，以董其昌画卷赠宋莘，宋就在卷后写下了“昭代鉴赏谁第一？棠村已歿推江村”的赞语，将高推许为继棠村梁清标之后的第一巨眼，极大地抬举了高的声誉。

《江村销夏录》三卷，著录法书名画共 210 件。虽然高士奇强调他的原则是“宁慎勿滥”，但这个数字也实在不算大。作品时代基本上始于唐，终于明中叶吴门四家，跨度也不算广。高氏自序中讲得很清楚，其中既有他自己的藏品，也有寓目之迹。但内文并未注明何件是何家所藏。高氏为这些寓目之迹所写的大量题赞诗文也都以“书画跋”的名义收录在他的诗文集里，未睹原迹的人很可能误以为被题跋的书画都是他的藏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于《江村销夏录》卷一，《高江村集·归田集》中又收录了一首题咏此图的五言长诗，给许多人造成此卷曾由高氏收藏的印象，该卷拖尾上金士松所书的沈德潜（1673—1769）两跋即持此说。实际上卷内卷外没有高氏的任何收藏印或题识。此卷入清后递藏诸家为季因是一王鸿绪—安岐—乾隆内府。高氏咏《富春山居图》诗作于 1692 年，其时图在王鸿绪（1645—1723）手中，诗中根本未提及此卷是高本人的藏品，显然是借观王氏藏品而作。又如本书卷三著录的唐代怀素草书《自叙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是徐乾学的藏品，本书卷二著录的明代文征明《湘君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名为《二湘图》）当时是耿昭忠、耿嘉祚父子的藏品，本书卷三著录的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改定为金代马云卿作）则是索额图的藏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江村销夏录》中著录的某些“名迹”，当时已有人指为贗品。如本书卷二著录的唐明皇《恤谪诏》，顾复《平生壮观》卷一即指为“椽（按原文如此，实当作掾）史笔耳，俗气侵入”；本书卷三著录的李公麟《蕃王礼佛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改定为元无名氏作），《平生壮观》卷七云“谓之龙眠，吾不敢附和也”；本书卷三著录的南宋夏珪《长江万里图》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吴其贞《书画记》卷一评为“用笔粗而弱,乃胜国人临仿者”。有清一代又陆续有人指出其中的鉴定疏误。如本书卷二著录的唐代柳公权《晋人修禊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名为《兰亭诗》),梁同书《频罗庵论书》指出是伪托;本书卷三著录的明代徐贲《石涧书隐图》、赵孟頫题诗合装卷,程庭鹭《藕庵画麈》详加考订、兼以目睹,亦定为伪本。

与大致同时的《书画记》、《平生壮观》以及吴升《大观录》等著录相比,《江村销夏录》较重视考订。这本是官僚士大夫的长项。清圣祖在高士奇死后曾解释说特别宠爱高是因为“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高氏的某些题跋确有见地,如卷三著录的北宋苏轼《李太白诗》(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高氏长跋指出:苏轼行书名迹以此卷与《寒食诗》二者为尤,而此卷尤以题跋灿然大观见长,并考证题跋者皆为金朝名士,因金人墨迹较宋人墨迹更为罕见,故此卷价值极高。这确是中肯之评。但正如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六所指出的:“江村虽精赏鉴,而考订则似非其所长。其所自作俱属诗篇,偶有题语亦多疏舛。”如本书卷一著录的元代何澄《归去来图》(今藏吉林省博物馆,名《归庄图》),高氏在卷后书一长跋,考该图作者失载于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却又将戴良《九灵山人集》中所载何监丞与该图作者混为一谈;又如卷一著录的《竹西草堂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名为张渥《竹西草堂图》),高氏误以为作者就是图中所歌颂的杨瑀(竹西),他虽记录图上有“贞期”印一方,却未加考订(其实贞期就是张渥的号),然后记录杨瑀在画上的题诗,又似乎明知杨氏并非作画者。此卷曾经明代项元汴收藏,项氏题为“元杨竹西草堂景,赵雍竹枝”,高氏显然是未加辨析地沿用了项氏旧题。

《江村销夏录》书成之时,朱彝尊已敏锐地察觉到其价值在于体例精详。书画著录之书,如果从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算起,也有千年以上的发展历程了,至高士奇此书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精密而稳定的登录体例,作者、题目之下,详载作品本地、尺寸(丈量较为精确)、书画

内容、技法类型、作者款识印章、他人观款题跋、收藏印记。且印章基本都依其原形描摹，内书楷书释文。这使得书画著录与藏品管理向规范化、科学化迈进了一大步，适应了清初文物交易业发达、私人收藏兴盛的时代需求，在当时不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为书画著录者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极强的范本。晚出十九年的《大观录》，在体例上就明显带有模仿《江村销夏录》的痕迹，惟不载印记而已。乾隆时编著内府藏品著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二书，“主编”之一张照（1691—1745）正好是高士奇的长孙女婿，由于他的影响，更由于《江村销夏录》体例上显而易见的优点，这两部内府著录就采用了《江村销夏录》的基本体例，惟印章但记释文而不摹绘印形。这两部内府著录是古代书画著录集大成之作，它们采用《江村销夏录》体例，无疑又使后者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其后私家著录仿之者不绝，如缪曰藻《寓意录》、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吴荣光《辛丑销夏记》、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周二学《一角编》、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邵松年《古缘萃录》、陈奎麟《宝迂斋书画录》，乃至清末关冕钧《三秋阁书画录》和庞元济《虚斋名画录》。有清一代著录之发达，与《江村销夏录》体例之易于操作实有关系。这些著录保存了大量史料，但颇有良莠不齐之憾，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指出：“著录书画之书，至江村是编而体裁始密，乾隆时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多仿之。后来著录之家，以其易于仿效也，遂以为定式。其弊也，不讲考证，不重真赏，而徒以钞胥为能。于是著录之书，几于汗牛充栋，而芜杂遂不可问矣。”《江村销夏录》之嘉惠与流弊，尽为道破。

高士奇死后两个多世纪，罗振玉发现了他的家传书画底帐——《江村书画目》，并在1924年以东方学会的名义刊行。此书不分卷，共记载书画518件，分为十类：进字一号、进字二号、送字号、无跋藏玩手卷、无跋收藏手卷、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又分字一号、画二号两类）、自题上等手卷、自题中等手卷、自怡手卷、明董文敏真迹。题下大多注明真贋、优劣、价格，少数还注明用途。“进”“送”者多为贋品和劣迹，价格低廉，没

有一件超过二十两；自己收藏的几类则多为真迹，其中“永存秘玩”类自注全部为真迹，价格亦最为昂贵，最高达五百两。罗振玉认为，“进字号”是进献内府之物，“送字号”供馈赠之用，高士奇竟以赝品欺瞒厚待他的清圣祖，“心术至此，令人骇绝”，刊印此书，可以彻底暴露高氏的丑恶面目。

实际上，《江村书画目》卷首注明“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月拣定进上手卷”，其时高士奇去世已整整两年，“拣定”者当系高氏子孙高輿、高岱等人。根据《书画目》中的种种痕迹来看，它并非如罗振玉所说的出于高士奇“手定”，而是在高士奇批注底帐的基础上，由子孙增删而成。进献赝品虽出于高士奇的授意，但在他生前并未来得及实行；死后虽由子孙挑选了一部分进献，但留在内府的实在少而又少。总之，如果根据《书画目》中浓厚的商业色彩和“进字号”的名目就推断康熙时代的官僚收藏家敢于置眼前经济利益于帝王权威之上，未免过于简单。

在肯定《江村书画目》中的鉴定批注基本可信的基础上，与《江村销夏录》作一对照，就会发现某些著录于《销夏录》的书画在《书画目》中明言为赝品，如《销夏录》卷二著录的晋代王羲之《游目帖》，载《书画目》“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字壹号”，注云“实系唐摹”；卷三著录的唐代褚遂良临《兰亭序》，亦载《书画目》“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字壹号”，注云：“米元章真跋，著名重宝”(今人徐邦达鉴定此件“领字从山黄绢本”系后临，米跋为真迹，但系后配)。这有可能是撰写《销夏录》时以假充真以壮门面，但也有可能是编制《书画目》时年老眼力提高而修正了鉴定意见，如果把此事和进赝联系起来，以为高士奇写《销夏录》时就处心积虑为十几年后的进赝作“理论准备”，那么《江村销夏录》的性质就近似明代张泰阶《宝绘录》了，这是缺乏根据的。《书画目》中的鉴定批注仍然是错误选出的，如它称为“上上神品”的柳公权《兰亭诗》，徐邦达定为盛中唐间一般书手抄卷，与柳无涉，其被称为柳书，系凭卷后黄伯思题跋，而这段题跋也是出于伪造；“永存秘玩上上神品”中的唐代卢鸿《嵩山草堂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名《草堂十志》)，高称为“上上真迹”，当时吴

升已定为李公麟作，稍晚安岐《墨缘汇观·名画续录》云“虽其笔墨高妙，当有疑议”，他们都认为不是唐画，今徐邦达则定为南宋人书画；同一类中的李公麟《潇湘图》和《蜀江图》，高称为“真迹，无上神品”，吴升则已正确指出是南宋人作品。

总之，《江村销夏录》和《江村书画目》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鉴定范例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但今天看来，它们的意义还在于反映一般官僚收藏家的鉴赏、考订水平，由高士奇名不副实而从者如云的情况，还可以反映出清代一般文人的学风。但《江村销夏录》毕竟是清代出版较早、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一部书画著录，此书经高士奇自己刊行（朗润堂本）后，晚清、民国屡有影印，亦有一些钞本流传；《江村书画目》则自东方学会刊行后未再版。时至今日，这两部书的刊本已不易见到，殊不便于研究。199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曾将此二书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断句排印出版，惜校雠未精，且为排版方便，将《销夏录》中极富特色的摹绘印章全部删去，同时收入的高士奇《书画总考》一书则已被余绍宋判定为伪托。此次标点排印，《销夏录》以朗润堂本为底本，摹绘印章一仍其旧。《书画目》以东方学会本为底本，附于其后。校勘记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订正。为便于读者使用，点校者将《销夏录》和《书画目》的全部条目分别加了序号。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央美术学院邵彦担任。

昔之善读书者，匪直晰其文义音释而已，其於简策之尺寸必详焉。郑康成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服虔传《春秋》称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而说《书》者谓每行一十三字。括苍鲍氏以之定正《武成》，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范》。予尝至太学，摩挲石鼓文，验其行数，据以驳成都志氏之作伪，因是而思汉儒订诂之学，有未可尽非者尔。评书画者众矣。广川董氏病其冗长；其余又嫌太略；宣和书画仅谱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馆阁之储，於金铜玉石悉识其尺寸，而於书画无之。盖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后贤而始大备也。钱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销夏录》，於古人书画真迹，为卷为轴为笈为绢，必谨识其尺度、广狭、断续及印记之多寡、跋尾之先后，而间以己意折衷甄综之，评书画者至此而大备焉。今之作伪者未尝不仿尺度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记，移真者附於伪，而以伪者杂於真。自詹事之书出，稍损益之不可^①，虽有大狙钜狡，伎将安施哉！詹事曩在内廷久，御府图书资以鉴赏者，历历犹能记忆，而不著於录，或疑不言温树之义。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尝奉诏题书画，每言之不敢详。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见录之。书成於康熙三十有二年六月，故以“销夏”名编。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顷，实藉以为负暄之助焉。秀水朱彝尊序。

云霞之变幻，岚之光，水之色，四时之繁花好鸟，有之不适於用，造物者亦不以是供世用；而无之则天地与四时若受其黜闇。顾是数者，俗之人莫之好也，惟夫旷达之士之有以乐乎此者，则私之以为耳目之娱。方数者之接於吾也，取焉而不穷，玩焉而不厌，而吾未常有也；及其欻然而敛，飘然而逝，而吾未常无，是谓以无有为有。以无有为有，则数者皆足以悦吾，而不为吾累。书画之於人亦然。而固者或执之以为有，则陋已。彼乌知夫天下之物凡聚者之必散耶？又乌知夫聚者未始非失，而散者未始非得耶？又乌知聚者之未常得，而散者之未常失耶？詹事江村先生，旷达者也。先生以殊才遭逢圣天子不世之遇，橐笔入僊禁庭，备顾问十有余年。一旦乞身而退，优游北墅，漱清泉、枕白石，迹与樵夫田叟狎，而欣然乐之。暇日取所见法书名画，考其源流、论次其甲乙如千卷，题曰《江村销夏录》。而其自序以谓世人竭财力以事收畜，与决性命以饗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览此者当作云烟过眼观。嗟乎！先生之言盖几於道矣。其视功名富贵、古今智勇之所争、史册之所传、钟鼎旂常之所烜耀，亦第如云霞、岚光、水色、四时花鸟之忽有忽无於天壤之间，而无所蒂芥，而况书画之区区者与？书来属予序，予不辞而序之，盖深有慕乎先生之为人也。商丘宋荦撰。

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间有挟卷轴就余辨真贋者，偶遇佳迹，必详记其位置、行墨、长短、阔隘、题跋、图章，藉以自适。然宁慎无滥，三年余仅得三卷，名曰《江村销夏录》。欧阳公所云“晚知书画真有益”也。曩在大内，伏见晋、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记其尺寸、录其跋尾；而海内诸家之所收藏，则又不能一一目睹，今姑略之。其所录者，皆余亲经品第、足资鉴赏者也。近代《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二编亦载世间名笔，而多未精详，恐尚有传闻之病。世人嗜好法书名画，至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饗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览此者当作烟云过眼观。康熙癸酉夏六月，江村高士奇识。

凡 例

一、海内名迹，收藏家甚夥，未寓目者不敢妄载。凡经评阅，随见随录，编次不以时代，亦未敢轻为甲乙。

一、晋唐已来书画所存名迹无几，其有《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诸书所已载者，偶以得见，仍为登录，非与之重复也。

一、古来书画名家，前人俱已识其爵里，兹录不赘。

一、前人所书古文辞，已见刻本者概不录，惟记其款识、跋语而已。其中与世本异同者，则详录以备考订。

一、是录以标目、尺度、评语为主，本文款识为第二，故下一字，题跋又下一字。至於图记不能摹入，但用楷字加圈以别之。其间文字损蚀难辨者，亦着方圈，不敢谬为增益。

一、录中间有一二为向日所藏，同人题语，后附小诗，或为人作跋者，今仍存之。

一、明代名家不啻数十，而文、沈、唐、仇诸君为尤著，然贋本实多，后人难辨，今遇真迹，必为存录。

一、董文敏公书画为近代第一，所见真迹甚多，另为一卷。

【目录】

- 朱彝尊序 / 1
- 宋萃序 / 1
- 自序 / 1
- 凡例 / 2
- 江村销夏录卷一 / 1
- 1 晋右军王羲之《袁生帖》 / 1
- 2 王右军书《千字文》卷 / 1
- 3 唐柳谏议小楷《度人经》卷 / 2
- 4 唐僧义道书《法华经》 / 3
- 5 唐张萱《汉宫祈巧图》 / 5
- 6 唐李昇《袁安卧雪图》 / 5
- 7 五代阮郛《阆苑女仙图》卷 / 5
- 8 五代董北苑《溪山行旅图》 / 6
- 9 北宋僧巨然《烟浮远岫图》 / 7
- 10 宋范文正公与尹师鲁二札 / 7
- 11 宋苏文忠公《送安国教授诗》 / 10
- 12 宋米南官书《诸体诗》卷 / 11
- 13 宋米元晖《云山得意》卷 / 14
- 14 宋李龙眠《华严变相》卷 / 16
- 15 宋李龙眠《设色莲社图》 / 17
- 16 宋司马端衡、米元晖诗意图 / 17
- 17 宋米元晖《五洲烟雨》卷 / 18
- 18 宋徽宗《文杏水鸟》 / 19
- 19 宋赵大年《荷乡清夏图》 / 19